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金融支持,满足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

——《政府工作报告》

厉以宁:中国经济头号风险来自金融

本报记者 王莹

“金融风险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长总是依赖投资的拉动。如果新的城镇化再走老路,全国一窝蜂式地花钱、盖楼,就会产生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大量债务”。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3月7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直言不讳地表示。

厉以宁担心这些风险容易促成金融危机。一个银行倒了就拖垮一批银行,一家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就断了一整条资金链,造成大量企业之间相互欠债,“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这是我们防范的风险。”

从温州金融改革,到深圳前海特区试点启动,金融改革“自下而上”的试验接连不断,而鲜见突破性的成绩;“自上而下”的一些重大议题同样推进缓慢,其中近20年一直推进的利率市场化以及金融机构内部改革等,银行信贷并非送达实体经济的急需部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

“自下而上” 摸石头过河改革难平衡

温州市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获批近一年后,已推出民间借贷中心、民间借贷利率指数等多项改革举措。

然而,对于金改一年的成绩,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2012年温州企业的困境,甚至比2011年更为严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温州市政府官员坦言,2012年温州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依然严峻。似乎拉开金改大幕的这一年,温州止步未前。

在周德文看来,民间资本参与设立金融机构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民间资本直接设立金融机构,哪怕是小银行,依然进入不了;此外利率市场化没有试点;个人资本、海外直投已经列入试点,但至今没有实际操作规则;而在监管方面,地方金融监管合法化现在还处于很尴尬的状况,尽管温州设立地方金融监管局,但其合法性没有得到明确。

那什么阻碍了改革的向前推进呢?周德文认为,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没有松绑放权,仍然按照现有的法律政策,不允许有突破,二是地方政府没有大胆改革,有畏难的情绪。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业



关于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必须要放宽银行业的准入,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办银行。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改革方案。

“自上而下” 顶层设计检验需时间

“衡量金融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是是否促进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增进经济转型等方面是否起到基础性作用。”潘向东向记者说道。

利率市场化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大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实现了重大的突破,在经历多年的酝酿之后,存款利率上限以及贷款利率下限终于被突破,利率市场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不过,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商业银行之间的利率并没有实现差异化,比如大型银行存款利率上浮幅度一致,而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基本上也没有太大差别。两会上对于利率市场化的讨论不绝于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表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需要通过市场环境的完善以及充分竞争,才能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整体配套的过程,不是说利率市场化马上就可以实现市场化了。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差异化的现象,比如有些商业银行根据客户的信用状况以及综合素质在贷款方面实行差异化的利率。”蔡鄂生说道。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梅兴保则认为为了避免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太大压力,可以在改革步

骤上,先贷款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市场化,而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可先长期、后短期,并发展以存款保险制度、发展利率期货等为代表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作为改革过程中的配套措施建设。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在两会提案中指出,体制改革必须深化,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引导民间资本建立金融机构,构建千企分布相匹配的“门当户对”的多层次金融体系。

“接下来加快推进资产证券化,适度的资产证券化对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增强银行业乃至金融体系的活力十分重要。”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指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必须要放宽银行业的准入,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办银行。当前很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获得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应该允许民间资本创办新的银行来为这些金融行业的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支持。

梅兴保则认为,改革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当前推进金融机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金融主体的角度来说,重要的抓手就是加强对中小金融机构现行的监管。这种监管原来主要是适应并针对国有大银行等一些大机构而设计的,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很多做法,虽然有很多创新,但在理念、方法、机构设置等方面,并不适应蓬勃发展的中小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的需要,特别是不适应它们的创新产品发展的监管需要。

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或诱发金融风波

本报记者 陈青松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由于在支持中小企业方面的金融政策改革步伐不快,两会各界人士多次呼吁国家放宽相关政策,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让困境中的中小企业快速、稳步地发展。

金改抓大不放小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提交提案建议,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限制,并给予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税收优惠。

郭广昌在提案中认为,小贷公司及融资担保公司已逐渐成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力量,国家相关部门应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发展。

对于小微企业融资服务机构自身融资受限,郭广昌建议取消“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其资本净额的50%,最多只能向两家银行金融机构融

资”限制。通过市场化操作,由银行金融机构自行决定是否要给小额贷款公司融资。

同时允许通过金融机构借款、发行企业债券、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等融资,并允许通过资产转让等方式进一步拓宽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渠道。

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招行行长马蔚华提出了包括创新权利质押担保方式、切实加大科技型小微企业金融支持力度、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等提案,以满足中小企业利用新型权利质押担保方式进行银行融资的需求。

对于为什么要改革金融体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原总裁梅兴保指出,金融体制改革与我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如果不全面改革我们的金融体制,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将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一旦国际市场出现变局,很可能导致因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产生的金融风波。

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

下一步又将如何改革金融体制,梅兴保表示,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金融主体的角度来说,重要的抓手就是加强对中小金融机构现行的监管。

两会期间,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深化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提案。提案认为,中国要在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必须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努力实现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提案建议,大力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的多元化融资渠道。放宽金融准入门槛,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通过适度竞争,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按照“国有主导,大、中、小共生”原则,大力发展民营小型金融机构;在大银行设立专项中小微企业信贷规模,借

鉴国外社区银行的成功经验,建立服务于中小微企业的专业银行。

民营企业78万户,个体工商户达到255万户,这是浙江在民营经济方面的具体数字,可见浙江民营经济高度发达。

全国人大代表、台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蔚荣带来了《关于在台州设立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议》。

在他吴蔚荣看来,要做好金融服务,就必须建立与当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金融模式,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从顶层设计层面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吴蔚荣建议,支持台州各小法人金融机构在地方监管部门的指导下,积极尝试各类小微金融产品创新;支持台州3家城市商业银行等小法人金融机构实行差别化的监管政策,在财政补贴、批量增信机构网点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此外,在现有政策框架内深化地方金融改革,吸收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

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 家庭农场亟待制度松绑

“

我国今后将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引导城市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重点发展种养业产前和产后服务、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和“四荒”资源开发等适合企业化经营的产业。

本报记者 陈青松

目前我国农村种养业普遍存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难题,这也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建议,把家庭农场纳入工商行政登记,确立企业法人地位,以便获得贷款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

刘永好说,在欧美,家庭农场主要是由四五十岁左右的农场主经营,只要两三个人,就能耕种上千亩土地。在这背后,离不开完善的金融贷款、设施配套、市场销售服务。

苦恼的农场主

七年前,湖北荆州的转业军人李均强回乡便承包了村里的十多亩耕地以及一口二三亩的水塘。

当村里人都纷纷外出打工时,李均强却一心想扎根农村,想在农村做出一番事业来,即通过科技种植养殖,发家致富。

此外,毗邻他承包的耕地和水塘旁边,还有一块七八亩谁也看不上的丘陵荒地。李均强又说服家里人,拿出家里不多的积蓄承包了那块丘陵荒地,请人将四周全部围上,并盖起七八间猪舍。

彼时,李均强认为,素有“鱼米之乡”美称的家乡一直不怎么富裕,关键是传统的种植种植方式太原始落后,只要科学种植养殖,长期下去一定会有收获。

于是,平时就爱钻研的李均强,实施起自己的宏伟计划:十几亩耕地,夏天种经济作物棉花,其余季节种蔬菜。七八亩丘陵则种上橘子、桃、梨等水果。

然而,多年过去了,李均强的规模仍没有做大,收入方面增长缓慢。

李均强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过于薄弱,这么多年来一直做不大,根本原因,还是缺钱。虽然自己刻苦钻研科技,也有农业专家指导,但没有资金的支持,规模始终上不去,辛苦不说,而且收入不高,风险也很大。

“没有大的资金投入,根本没办法进行规模化种植。”李均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没有担保,贷款困难,缺乏创业启动资金,我不得不‘望地兴叹’。”

记者了解到,像李均强受资金困扰、想实现规模化种植养殖的农民在广大农村还有很多。

家庭农场成资本下乡重点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而“家庭农场”首次被提到。

据介绍,我国今后将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引导城市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采取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订单农业等方式,重点发展种养业产前和产后服务、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和“四荒”资源开发等适合企业化经营的产业,带动农户发展产业化经营;鼓励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和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在中央有关“资本下乡”的文件出台后,引起业内专家学者热议。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熙保认为,龙头企业资本雄厚,承包的土地较多,涉及的农民人数较多,带动力和辐射力较强,而且是工农结合,城乡一体,影响特别大,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主导方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中包括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到的家庭农场。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书平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特别关注现代农业发展中“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

王书平建议,制定扶持“家庭农场—农业龙头企业”建立产业化联盟的优惠政策,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为家庭农场生产提供产前、产中与产后系列服务,将家庭农场与农业龙头企业有机统一,开展订单收储,依托产业化联盟建立物流配送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张晓山表示,家庭农场主就是职业农民,应该实行登记注册制。

据悉,以工商资本为主导的龙头企业带动模式在我国各地发展较快。其中,湖北武汉、上海松江、吉林延边、浙江宁波等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农业部确定的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2年前,湖北春晖集团在孝感市孝南区将6000多亩土地整体流转,成立全省第一家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初步实现了分散粗放经营的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种植、机械化作业、职业化管理、产业化经营的现代农业转型。二年来,合作农户每亩纯收入636元,同比增收11%。